

文化技藝、媒介考古和控制論： 德國媒介研究近況闡述

許媚媚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助理研究員

摘要

近年來，德國媒介理論在華語學術圈頗受關注。基德勒、齊林斯基、埃爾塞瑟、克拉瑪及近期的皮亞斯、恩斯特、西格特、威茲曼等人及其著作受到譯介，媒介考古、媒介技術、文化技藝等概念也得到一定闡述。然而譯介零散、研究不足，常造成認知混亂和理解困難。本文基於比較和歷史研究的方法，試圖將「德國媒介研究」置入德國傳播學史及其代際演變之中，在多種媒介體系的參照下，考察與德國媒介學派開創者基德勒有著密切聯繫且影響日盛的三種代表學說：文化技藝、媒介考古和控制論，以此來梳理和探討德國媒介理論從 1980 年代至今所呈現出的反叛、變節和遞歸的變化脈絡。

關鍵詞：文化技藝、控制論、基德勒、媒介考古、德國媒介理論

* E-mail: xumm@nju.edu.cn

投稿日期：2021 年 4 月 8 日；接受日期：2021 年 10 月 28 日

壹、前言

當前德國傳播學的研究陣地，主要是以兩份期刊及其各自背後的協會為主要發展基礎：一是創立於 1963 年的《新聞學》（*Publizistik*）¹，這是德國新聞與傳播研究學會（Deutsche Gesellschaft für Publizistik-und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DGPK）旗下的老牌傳播學期刊，延續了 1960 年代的傳播學研究傳統；另一則是創立於 2008 年的《媒介研究雜誌》（*Zeitschrift für Medienwissenschaft*），由媒介研究協會（Gesellschaft für Medienwissenschaft, GfM）來推動，專注媒介研究，是當前德國媒介理論的代表性刊物。這兩份期刊呈現出明顯的方法論和風格差異，前者是傳統傳播學的社會學取向和實證研究，後者則是隨著最近十年德國媒介理論的發展分化而來，具有強烈的技術取向。兩者之間的對比與關聯，折射出德國傳播學百年來獨特的發展史和概念變化。然而，這樣的敘事內涵有很多細節猶待釐清，也因而形成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二十年，德國傳播學術界的現況，以及在傳播領域中相關的思想內涵與變化各自為何？

在德國傳播學史中，除沉默螺旋和少數幾位學者，如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外，中文世界裏對傳播相關研究的譯介和關注並不多，這在兩岸三地的華人世界中大體如斯。現代德國體系中，與傳播研究有關的學術概念主要有新聞學（*Journalistik*）、大眾媒體學（*Publizistikwissenschaft*）、傳播學（*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以及媒介學（*Medienwissenschaft*）等四大領域，這些也分別代表著德國新聞傳播學在不同時期的發展特點（吳璟薇，2017）。簡單來說，這種在「報學——傳播學——媒介學」之間形成的代際演變，是今日傳播領域的關鍵內涵。

1916 年經濟學者比歇爾（Karl Bücher，1847-1930）在萊比錫大學首設報學研究所，開啟了德國傳播學的新聞學研究傳統。同為第一代報學奠基人的還有美因茨的杜蔚發（Emil Dovifat，1890-1969）和慕尼克的德斯特（Karl d'Es-ter，1881-1960）等，他們尤為關注新聞學的政治功能和輿論。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報學傳統逐漸衰落。在 20 世紀 60 年代，受到美國的影響，德國開始盛

1 目前這份雜誌尚無規範的中文譯法，*Publizistik* 德語原文直接翻譯是「報學」，但這無法與早期萊比錫大學的報學專業傳統區分開，無法體現出 60 年代以來的實證研究轉向；將其譯為大眾傳播學又不合適，因為大眾傳播學的德文是 *Massenkommunikation*；此外，*Publizistik* 與廣告出版也有密切關係，但翻譯成廣告或公共關係也不恰當。鑒於上述考慮，文中將該雜誌名翻譯成《新聞學》，因「新聞」一詞具有極強的概括性，在中文世界裡也以廣義的形式被使用，一些既有的文獻有不同的翻譯法，如下一頁李漫（2013）的「大眾媒體」，請讀者辨別。

行民意研究。諾爾紐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1916-2010）於 1966 年在美因茨大學創辦大眾傳播學院（Institut für Publizistik）將量化研究方法開始引入德國新聞傳播學，開啟了從新聞學向大眾媒體（Publizistik）研究的轉變，也標誌著傳播學作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在德國確立下來（李漫，2013）。與第一代報學形成對比，第二代傳播學研究者更多將傳播作為社會整體的一部分，採用實證方法對大眾媒體和電視廣播進行探索，關注傳播者問題、媒介效應及其使用。在此期間，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學說以及阿多諾（Theodor Adorno，1903-1969）與霍克海默（Horkheimer，1895-1973）的文化工業批判等思想進一步推進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發展。

1980 年代以來，隨著技術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傳播現象開始擴大，大眾和個人傳播的界線消弭，傳播學在聯邦德國內部開始分化，誕生了「跨學科的傳播學」，如遊戲研究、運動傳播和健康傳播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紀 90 年代，德國傳播學的主流依然是量化研究。對此，現代德國傳播學「孵化者」（Nestoren）² 之一的馬勒茨克（Gerhard Maletzke，1922-2010）感慨地寫道：

倘若在傳播學的萌芽期，那批教授中能有一個人能夠致力於人文的、完整的一質性的（ganzheitlich-qualitativen）範式的研究，那麼今天傳播學的份量配比就另做他論了（Maletzke, 1997, pp. 113-114）。

在他看來，理論與經驗材料的關係亟需調整，傳播學の後繼者應當是學者和理論家，而不是做研究的技工。對此，另一位「孵化者」Helmut Kreuzer（1927-2004）表示：

今日世界要求一種泛媒介學（Allgemeine Medienwissenschaft），能夠在無損自身的情況下與語言學合作，在概念上融入泛文化研究（Allgemeine Kulturwissenschaft），並作為子學科與其他學科交叉融合，帶入多種學術研究的興趣（Kreuzer, 1997, p.236）。

可以說，德國傳播學史的第三次演變——媒介學轉向——便是隨著數位

2 德國傳播學家 Arnulf Kutsch 和 Horst Pöttker（1997, p. 8）在《傳播學傳記：一種學科在德國的發展》中將比歇爾、杜蔚發、德斯特等報學創立者稱為「奠基人」（Gründer），將 1960 年代後聚集在《新聞學》期刊周邊，致力於新聞傳播研究和教育的代表人物，如 Franz Ronneberger, Elisabeth Noelle-Neumann, Otto B. Roeggele, Gerhard Maletzke, Harry Pross, Joachim Pötschke, Alexander von Hoffmann, Hertha Sturm, Helmut Kreuzer, Kurt Koszyk 稱為「孵化者」（Nestoren）。

化 (digitalization) 以及這種基於總體價值定位轉變上的人文召喚而來。

最早提出通用媒介學概念定義的是科尼利 (Friedrich Knilli)，他在 1972 年將「媒介」(Medium) 的物理概念引入交流過程，因為每一種交流都需要一種「物理的轉移媒介」(Pias, 2016, p. 17)。而媒介學作為一種代表文本和文化學的概念，則可以追溯到 1960 年代聯邦德國的文學和戲劇學。在 90 年代，隨著關注媒介以及內容的審美和技術的人文學科取向的媒介研究的興起，對於「媒介」的不同定義，形成了不同的媒介體系視角。在法蘭克福學派自發的泛媒介反思中，媒介變成了依附於資本主義經濟並由經濟變化而決定的一種文化工業化表達；在麥克魯漢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 為代表的多倫多學派看來，媒體成為了萬物起源並進而演變為通用的解釋模式；而在後現代的流行文化現象下，在注重媒介語言學的法國後結構主義和文化研究看來，媒介學幾乎與文化同步 (Schröter, 2014)。

正是在這多種體系參照下，德國媒介學派開創者基德勒在《留聲機、膠捲、打字機》(*Grammophon Film Typewriter*) 的開頭寫下「媒介決定了我們的處境」(*Medien bestimmen unsere Lage*) (1986, p. 3)。事實上，在前一年的《論述網路 1800 / 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 中，基德勒就考察了技術媒介對於 19 世紀文學和書寫實踐的衝擊，他將媒介提升到了本體論的高度，關注那些「使得給定文化進行選擇、儲存和處理相關數據的技術和機構網路」(Geoghegan, 2013, p. 66)。如果說麥克魯漢在人類感官的精神下，提出了媒體的擬人系譜學 (anthropomorphic genealogy)，那麼基德勒的技術邏輯本體論 (techno-logical ontology) 則與之相反，強調「只有可切換的才存在」(Krämer, 2006, p. 106)。可以說在基德勒時代，德國媒介理論最大的貢獻是反叛式地清理了人文主義的文化包袱 (*Austreibung des Geistes aus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由此從理性批判轉向媒介批判。

這種「技術狂熱」(technophilia) 的方法論取向，將德國媒介理論與英美文化研究的後人類主義區別開來的時候，也帶來了一些困難。一般來說，在嘗試處理基德勒的媒介理論文本時經常會遇到兩個阻礙：其一是在基德勒看來「只有可切換的才存在」，他因此排除了身體作為一種媒介，並且忽視了人類感知；另一阻礙是山農 (Claude Elwood Shannon, 1916-2001) 傳播理論在基德勒書寫中所佔有的經典文本地位 (Krämer, 2006, p. 95)。此外，基德勒本人在晚年轉向了古希臘的象徵符號，這使得基德勒及其弟子們對於 1980 年代中期後的個人電腦時代沉默，無法對當前的技術媒介條件發聲：

基德勒從來不是基德勒式 (Kittlerian) 本身 (事實上, 很少有話語創始者的方法與以他名字所命名的學派等同), 而且他在挑戰正統性時最為舒適——即使這些挑戰被歸入他名下。即便如此, 這種轉變似乎使得他最忠誠的弟子們最後很孤單, 只能寫作死亡媒體 (dead media) 和死亡理論的技術史 (Geoghegan, 2013, p. 69)。

「基德勒式」的德國媒介學後繼者們在對基德勒文本阻礙上的探索和突破, 促使「德語媒介理論在 2000 年代朝著分析上的行為學風格發展」(Geoghegan, 2013, p. 66), 並由此衍生出當前德國媒介研究裏最引人矚目的三種學說思想: 文化技藝、媒介考古和控制論。這些思想和基德勒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 沿襲傳承的西格特 (Bernhard Siegert) 在威瑪執掌「文化技藝與媒介哲學國際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es Kolleg für Kulturtechnikforschung und Medienphilosophie, IKKM), 嘗試對媒介技術思想進行突破, 推動其向文化技藝轉型; 基德勒在洪堡大學的教席則由深受其影響的同事恩斯特 (Wolfgang Ernst) 繼承, 並發展出別具一格的檔案媒介考古學; 而他的計算研究則被任教呂納堡大學的另一位弟子皮亞斯 (Claus Pias) 發揚光大。這些物質基礎的類似與辨明初步揭示了本文的出發點, 底下將分別就相關概念進行更完整的爬梳。

貳、文化技藝

在 2000 年初, 推崇基德勒方法的學者們就將注意力投注到文化技藝上。作為文化技藝研究大本營的 IKKM 已存在 12 年之久, 旗下的刊物《媒介與文化研究》(*Zeitschrift für Medien-und Kulturforschung*) 也發行了 11 年。2020 年 2 月, IKKM 的資助到期, 所有研究活動終止。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標誌著 2000 初發起的文化技藝轉向正式完成。然而, 這一概念在中文世界的影響力才剛剛開始。站在 2021 年這一時間節點, 回顧德國媒介理論近三十五年來的歷程, 可以完整觀察到基德勒以「媒介技術」對人文思想一貫以來的闡釋學傳統的「天才式反叛」, 以及其後繼者們聚集於「文化技藝」之下, 對基德勒思想的「變節式」發展, 更能找尋到近年來德國媒介研究所呈現的最新態勢。

「文化技藝」(Kulturtechnik) 與基德勒淵源深厚。基德勒於求學及任教

弗萊堡大學時期已留意到這一概念。該詞在當時德語中主要指閱讀、寫作和算數的能力。1983 年夏末，基德勒在撰寫《論述網絡 1800 / 1900》的序言時首次使用，不過該序言並未正式發表。接下來的二十年裡，該詞的位置為「技術媒介」所取代。雖然基德勒本人未再特別發展這一概念，他還是將其帶至柏林，並成立了赫爾曼文化技藝中心（Hermann von Helmholtz Centre for Cultural Techniques），這也為柏林學派持續地專注於研究閱讀、寫作、製圖和音樂這類元文化技藝（ur-cultural techniques）的符號系統（notation system）奠定了基礎。這一切，似乎在為文化技藝後面的發展鋪路（Siegert, 2020）。

文化技藝研究的代表學者西格特認為，該詞涵蓋了諸多在英美地區被標籤為「德國媒介理論」的內容，其研究焦點從意義的再現轉至再現的技術條件（Siegert, 2013）。然而，區別於基德勒反闡釋的早期德國媒介理論，文化技藝是一種後闡釋（post-hermeneutics）。兩者興起的歷史語境不同，前者於 80 年代德國「公共空間和戰爭」的極化限制（polemical restriction）下出現，具有鮮明的反人文色彩，「人」被基德勒譏諷為「所謂的人」（der sogenannte Mensch）；後者則風行於 21 世紀初，推翻了基德勒式分析中的反生物主義，對人持有更為寬鬆的態度。

西格特對該詞做過一番語義考察：

文化技藝作為一個複合詞，由文化（Kultur）和技藝（Technik）合成……策略性地顛覆了媒介和文化備受爭議的二元論，將媒介、文化和技藝開放至進一步的探討之中。文化技藝並不局限在基於圖像、文字系統和數字的符號實踐，還包含牟斯（Marcel Mauss）所言的「身體技藝」；文化對於身體的使用包括儀式、習俗、習慣，以及訓練和規訓系統、營養學或衛生實踐等。媒介是無法被符號化的真實和文化秩序之間，由代碼所產生的交互介面。每一種文化都始於區隔（distinction）：裏／外、神聖／褻瀆、智慧語言／胡言亂語、信號／噪音。這些文化技藝的基本操作負責自然和文化的區隔，如蠻族與文明，便是一種過濾操作（Siegert, 2007, p. 29）。

文化技藝關注那些「構成技術與文化系統的那些先在的器具、實踐和符號的配置」（Geoghegan, 2013, p. 70），強調人類實踐，並含有一些跨文化的元素。這一類似西格特所言的「最廣義的」（broadest）文化技藝定義，

吸引了大批德國媒介學家。在西格特的宣導下，皮亞斯、克拉瑪（Sybille Krämer）、威茲曼（Cornelia Vismann）、溫特洛普·楊（Geoffrey Winthrop-Young）等學者均加入了討論。例如，關注律法和媒介技術的威茲曼認為，「探索文化技藝便是在追問媒介和物的自我管理（Eigenpraxis）」（Vismann, 2013, p.84）；溫特洛普·楊（2014）則認為，文化技藝指代那些可以被聚合為整體（entities）的操作，也可視為執行這些操作的代理（agents）或者資源（轉引自 Siegert, 2020, p. 134）。他們對於文化技藝的範圍界定和著眼點各有不同，這也折射出德國媒介學派本身的異質多元。

如果說，2000 年初的文化技藝概念，更多的是對基德勒狹義「媒介技術」想法的拓展以及對其所忽視的身體和人類感知的修補，那麼 2020 年的文化技藝研究，可以通過考察西格特所主持的 IKKM 及旗下刊物《媒介與文化研究》近三年的專題，發現一些端倪。

該雜誌 2018 年第一期的專題為「媒新世」（Mediocene）。該詞源自地理學概念「中新世」（Miocene），意即地質年代的新近紀的第一個時期。西格特與恩格勒（Lorenz Engell）等人將其改造為「媒新世」，用於研究人類存在與媒介進程功能的關係，比如媒介與地球改造、電腦與氣象監測等（Engell & Siegert, 2018, p. 7）。該概念補充和糾正了英美人類中心主義的「人類世」（Anthropocene）模型，強調「媒介性」（Medialität）構成自然與文化之間的概念關聯。延續「最廣義的」文化技藝界定，西格特和恩格勒主張，在理解媒新世時，非西方的世界概念和地球觀，以及非霸權的認知論和本體論具有重要價值（同上引）。

《媒介與文化研究》2019 年第一期的專題為「本體」（Ontography），重申文化技藝在本體論層面與傳統本體論（Ontology）的差異。哲學傳統上的本體論是基於現實的一種猜想，而文化技藝則是物導向（object-oriented）的可操作本體論（operative ontologies），這也使其成為一種關聯主義（correlationism）的媒介理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聯結起來（Engell & Siegert, 2019, p. 8）。西格特指出，拉圖（Bruno Latour）在《我們從未現代》（*Nous n'avons jamais été modernes*）中早已辨別出「雜交體」（hybrid objects），並將其作為準物體（quasi-object）用於指稱「物與人佔有和生產出彼此的一種成為集合（a becoming-collective）」（Siegert, 2020, p.135），這與文化技藝頗為相近。同時，西格特還警告了當前後行動者網絡理論中氾濫的「聚合」（assemblage）熱忱：「事件中的主體與客體、形式與物質、

被動與主動被無差別地同一化。技術因此被當成一種無法再被質疑的成為 (becoming) 」(同上引)。

《媒介與文化研究》2020 年第一期 (也是最後一期) 的專題為「切換和統治」(Schalten und Walten)。西格特和恩格勒藉助這一海德格用語, 回顧、總結了 IKKM 多年來的文化技藝研究, 特別是其所宣導的可操作本體論, 認為該詞的英文翻譯「switching and ruling」無法表達其德語意味:

作為德國日常生活用語, 「切換」是一種統治或者管理, 與對某物的控制、干涉及變化相關, 是操作性的, 有著獨特的方式和因果關係; 而「統治」則是不可言說、不可切分的, 並不基於獨特性或決定性, 並不以干涉或特殊行動的方式出現。德語中將切換與統治分開, 恰恰是將其聯繫在一起。切換和統治是可操作本體論核心的雙重概念 (Engell & Siegert, 2020, p.5)。

「切換」本身是一種操作, 「與對某物的控制、干涉和變化相關」, 因此是可操作的。典型的切換如數位中的 0 與 1, 又如電路中的 on 與 off。在數位時代, 不僅自然本身成為海德格夢想不到的「持存」(Bestand), 還瀰漫著一種決定了何為物及物如何存在的技藝上的 (日益數位化的) 操作。

西格特和恩格勒進而認為, 早期媒介理論中有一種「失衡」: 推崇「切換」而忽視「統治」。例如, 基德勒就宣稱「只有可切換的才存在」。文化技藝則調整了這種「失衡」, 因為在「現實中, 切換這一操作無法脫離統治而獨立完成。有效、精準的操作, 必須落到實處」(Engell & Siegert, 2020, p. 7), 「統治時常凌駕於切換, 如果說可切換的才存在, 那麼所有的切換都需要一種統治去促使它產生」(同上引, 頁 11)。

藉助上述分析, 可將近三年來文化技藝的新發展簡單統括為: 對話英美, 提出「媒新世」; 強調關聯, 發展可操作本體論。西格特等人將文化技藝推至數位當下, 認為「閱讀、寫作、算數和繪畫等元文化技藝已包含遞歸操作鏈, 將人與更高級的媒介功能 (如儲存、傳輸和運算) 組合起來」, 並在 1983 年和 2000 年的「基礎 (elementary) 文化技藝」之上, 加入「原始 (primitive) 文化技藝」(Siegert, 2020, p. 133), 關注元文化技藝之下的層次, 比如構連 (articulation) 這種原初過程 (primary process)。如果說, 傳統的本體論的區隔僅關注某物為何與某物非何的區分, 那麼原始文化技藝則將某物置入動態過程, 作為「過程」來進行考察, 2020 年的文化技藝也因而更具

可操作性 (operative)。

參、媒介考古

2006 年，基德勒在接受採訪時曾提到媒介考古學：

媒介考古作為一種用於媒介技術的社會歷史方法，我花了很長時間才釐清這一概念，以及恩斯特的專案的精確本質。現今，我已理解了它，那麼我要強調一下恩斯特的寫作非源於我，這點很重要。兩者有相似之處，恩斯特與今日許多人試圖擺脫一種歷史的敘事方式，我認可這項專案並非常喜歡。然而，就我所知的（部分來自恩斯特）是我們必須停止對書寫、計算、數學或者音樂的歷史進行線性敘述。這也是我一段時間來所嘗試的，比如在〈全球演算法：傳播媒介史〉這篇文章中所做的。就結果而言，我的感受是，與其關注歷史，我們應該取而代之去思考我們稱之為「遞歸的歷史」，在那裡，同樣的議題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規律的間隔出現，但是有著不同的含義和結果 (Armitage, 2006, pp.32-33)。

基德勒明確否認了自己的學說是媒介考古，但又承認兩者存在相似。那麼，何為媒介考古？它與基德勒及德國媒介理論有何關係？直至今日，對於媒介考古的原則或概念，尚未定論。一般來說，媒介考古被認為是一種或多種相近方法的集合，在學科間流動，居無定所，是一種「游牧主義」(nomadicism)。在英國媒介學者胡塔莫 (Erkki Huhtamo) 和帕麗卡 (Jussi Parikka) 看來，將媒介考古學者集聚起來的共同驅動力出自對「經典化」的媒介文化和歷史敘事的不滿，以及對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的閱讀 (Huhtamo & Parikka, 2011, p. 3)。就德國而言，受基德勒著作的影響，關於媒介考古的討論在 1980 年代晚期出現。西格特認為，在德國，媒介考古經常是「媒介史」的混亂，是尼采意義上的「輕盈的科學」(Gay Science) (Siebert, 2007, p. 28)。與英美媒介考古關注內容、用戶及再現的文化研究傳統不同，其在德國的變體是「硬體媒介考古」(hardware archaeology) (Huhtamo & Parikka, 2011, p. 8)。兩派陣營似乎存在某種學術爭奪。胡塔莫和帕麗卡等英美媒介學家試圖從廣義的方法論角度，招安德國媒介理論，西格特的郵政系統研究、恩斯特的檔案媒介考古、皮亞斯的電腦遊戲研

究，均被視為媒介考古；德國媒介學家則試圖將媒介考古納入麾下，或許正是出於這一考量，西格特將基德勒式媒介理論寬鬆地（loosely）與媒介考古約等。

無論如何，提及德國媒介考古，不得不提到兩位重要人物：埃爾塞瑟（Thomas Elsaesser）和齊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前者宣導電影史作為媒介考古，認為「媒介考古的出現，更多的是一種時代徵候，是隨著『過時的詩學的』藝術而出現」（Elsaesser, 2016, p. 354）；後者則宣導「勿要於新處覓舊，而要於舊裡尋新，潛入『深度時間（deep time）』」（Zielinski, 2006, p. 3）。與基德勒類同，齊林斯基亦是一位反叛者。他「不僅反對主流媒體文化的整齊劃一，也反對媒介考古學本身，特別是反對將媒介考古同化和固化為當前媒介研究的常態」（Huhtamo & Parikka, 2011, p. 12），而這種對於系統化和理論化的對抗，也使其媒介考古存在原子化（atomism）的風險。

相較而言，一般的媒介考古更偏向方法論，而所謂的德國媒介理論則是基於共同的「技術先在」（technological a priori）而湧現出的具有高度建構性和強烈個人化風格的理論集合。兩者在性質上，並不具可比性。表面上，兩者均有「反歷史的」（ahistorical）傾向，然則，其對待歷史的方式不盡相同。一般的媒介考古尚屬歷史學的浪漫主義，始終囿於歷史的框架，而基德勒式媒介理論，以硬體浪漫主義的方式，「用數據處理（data processing）抹煞了科學與文學的差異語境」，並不依賴於人或人的歷史而存在，因為「技術媒介的操作邏輯恰恰是在結構化的數據流中形成，後者以躲過『人類感知時間』雷達的方式進行著」（Krämer, 2006, p. 103）。以拉岡式的簡單對應來說，英美的媒介考古依舊作用於「象徵」（symbolic），而德國媒介理論則認為當前的技術，早已越過人類感知的閾值進入到「真實」（real）。

如果說，基德勒與一般媒介考古存在本質區別，那麼，是否存在一種基德勒式的媒介考古呢？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恩斯特「柏林品牌」的媒介考古。其學說聚焦硬體物質性與時間（hardware materiality and time-critical），具有強烈的技術中心主義色彩。和文化技藝一樣，恩斯特的媒介考古在近幾年也發生了變化。其早期研究側重對傅柯「檔案」（l'archive）的技術改造，近來則關注數位，發展為「激進媒介考古」（radical media archaeology），與英美媒介考古進一步區別開來。

激進媒介考古著眼於信號化的「再現」（re-presencing），強調對邏輯

結構的考察，是一種數學式媒介考古。在恩斯特看來，「技術一詞應當在字面意義上展開：召喚物質硬體的操作（*techne*）以及對其進行編碼的行動（*logos*）」，也即，物理上的工藝品 *artefact*（古希臘語 *techne*）和數學分析（*logos*）。這兩者在涉及計算設備時，構成複合詞『*techno/logy*』」（Ernst 2018a, p. 38）。

除了數學式，別具一格的還有恩斯特（2018b）的時間式媒介考古。通過對「媒介」進行詞源學分析，他發現：亞里斯多德在使用“*metaxy*”（媒介）時，經典的時間定義明顯是與運動（流動）的感知相聯；而在黑格爾那裡，外部時間（*external time*）變為內在時間（*Eigenzeit*，身體和精神上「內化」了的記憶）；隨之而來的是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時間的時間化（*Zeitigung der Zeit*）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空間為速度所弑」（*space is killed by speed*）。在恩斯特看來，「流動」這一現代用語已是 20 世紀的範式特徵，在數位當下，「傳播的基本模式已不再是從 A 點到 B 點，而是瞬時配置的修改。伯格森意義上的『綿延』（*durée*）變成了頻率功能……時間本身在媒介空間（*mediasphere*）內移動。數學時間本身變為可操作，導致時間從時間的指示上脫落，對時間—信號進行技術—數學上的空間化，導致將來已被預期為一種『過去中的未來』」（Ernst, 2018b, p. 175）。

對於這種可操作時間，恩斯特稱之為「時間詩學」（*chronopoetics*）（Ernst, 2018b, p.178）。Krämer（2006）認為恩斯特將時間性（*temporality*）的考量帶入到更為激進、非人風格的——一種過程的物質主義中。這使得恩斯特的媒介考古呈現出極端反歷史、高度數位化的傾向。在他看來，「歷史媒介考古（*historical media archaeology*）這一說法（偶爾會被基德勒使用）是矛盾的。歷史和媒介考古並不相容」（Ernst, 2018a, p. 37）。這種激進也使得恩斯特對於「記憶」有著獨特的理解。他認為，在數位當下「地點明確的記憶被媒介明確的儲存、召喚和傳輸所取代。象徵性的城市景觀成為底層媒體基建的現象學功能，出現在之前文化和集體記憶所遺留下的虛空之中」（Ernst, 2018b, p. 164）。

在方法論上，激進媒介考古推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將攝影師作為外科醫生的比喻，以及傅柯對診視（*clinical gaze*）的關注。在恩斯特看來，媒介考古的凝視應當是聚焦技術現象本身的數位解剖，對計算設備的「挖掘」（*excavation*）在於拆散機器可閱讀的代碼，進入到程式代碼。因而，激

進媒介考古並不會使人感到憂鬱（non-melancholic），因為「過去的媒體並未死亡（un-dead），原則上（en arche）是可重演的，是隱性、潛在的時間延遲（delta-t）……任何瞬間均可如信號般啟動」（Ernst, 2018a, p. 39）。

簡言之，恩斯特將傅柯的檔案改造成數學與機器聯姻下的新型「檔案」，「這種即時社會的新檔案全然存在於當下，而藉助數位媒介得以擴展的當下，已經成為一種通用檔案」（Ernst, 2014）。恩斯特因此質疑，已被數位人文全面裹挾的學術分析，是否依然與數位社會保持著應有的批判的距離？

肆、控制論

「控制論是人類兩千年來在知識樹的果實上咬到的最大的一口」，皮亞斯在《控制論：梅西會議，1946-1953》（*Cybernetics: The Macy Conference 1946-1953*）的導言裏引用了英國社會科學家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的這句名言，提出「控制論時代」的到來，並介紹了控制論的基本概念：切換布林演算法、資訊理論和回饋。在他看來，三者的共同前提為數位性，只有當人與機器在同一數位基礎上操作，人類知識與機器知識相容時，控制論的認知論方能奏效。也因此，控制論歷史上意義重大的梅西會議，自 1946 年首次召開以來，便重複圍繞於對類比和數位的意義理解，致力找尋一種「一般理論」（a general theory），後者主要包含：「電腦原理、神經生理學、以及對精神病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一種模糊的『人文主義的』組合」（Pias, 2003, p. 11）。

在將梅西會議的原始記錄集結出版外，皮亞斯還撰寫了一系列控制論相關文章，其本人也被譽為「重構了由於無視技術及其認知論的總體文化、在德國失傳已久的控制論遺產」（Horn, 2008, p. 11）。皮亞斯將控制論引入文化技藝的探討，提出「數位文化」這一表述媒介技術與世界文化塑形間複雜關係的概念，著重關注計算模擬（simulation）（Pias, 2017, p. 89）。在其看來，計算模擬自 1945 年以來，已發展為一種文化技藝經驗，給世界帶來了另一種基礎性的定位可能和必要，是最具意義的控制論科學史遺產之一。計算模擬塑造了「世界觀」（Weltbilder）和全球化社會的整治行動空間，在複雜危機場景下（如，氣候變化、流行病或金融市場機制），表現得尤為明顯（同上引）。

皮亞斯認為，控制論研究終結了闡釋學和啟蒙運動，催生了作為技術論

述（基德勒）、結構（德希達）或系統論（魯曼）的那些方法（Pias, 2003, p. 25）。從認知論的角度來看，系統論可理解為「構築系統的這些人與描述系統的那些人之間的一種勞動上的區分」，數據則可理解為「同時作為象徵的基礎元素和物質的真實」的概念（同上引）。大數據時代，「是什麼與應是什麼的關係崩塌」，呈現「浩劫重生」（arcunum）的景致，「基於數位基礎的全媒介鏈接抹煞媒體概念本身，取代人與技術連線的則是，作為無限迴圈運行著的絕對知識」（同上引，頁 26）。

無獨有偶，克拉瑪在分析基德勒的時間軸操縱時，也描述了一幅類似的末日景象：

媒介學由此超越了自然與社會科學的鴻溝，到達不存在逆轉可能的程度。人類身體由於從屬於時間的不可逆，因而不能再被視為媒介。機器取代人成為傳播的指稱對象（referent）……這種將歷史主題化為人及其身體的消亡史的看法，是否末世論（Eschatolog）的媒介技術版呢（Krämer, 2006, p. 107）？

換言之，當前德國媒介研究的控制論，已發展至「後控制論」（post-cybernetics）。Ernst (2018b) 藉助對電腦和控制論的激進考古，發現控制論的（即系統論的）假設是以「後」（post）為首碼。「後」在字面上，意味著技術上所預設的雙重捆綁³的數位遷移。西格特則從文化技藝出發，從控制論歷史角度去理解德國媒介理論與美國後人類論述的異同，認為：

在美國，「後人類」概念出現於人機界限模糊化的框架內，他們的後控制論媒介研究因而與身體及生物思考相連；德國媒介理論肇始於對闡釋學及傳播的社會學傳統上的意義史（history of meaning）的反叛，因此，德國媒介理論的指導問題並非「我們如何成為後人類？」，而是「人類如何早已歷史地與非人混在一起？」（Siegert, 2013, p. 53）。

在後控制論時代，皮亞斯嘗試推進和突破其原有的研究。近年來，他一方面延續之前的電腦遊戲研究，主持「遊戲化：遊戲與非遊戲的邊界轉換」

3 雙重捆綁（double bind theory）是貝特森在研究精神分裂時所觀察到的，某些家庭關係中孩童對於父母所傳遞的資訊，無論做出正向或反向的回應，均會招致懲罰，從而陷入兩難境地。長此以往，導致失語、精神分裂等症狀。該理論後來被嘗試引入社會分析（Bateson, 1987, pp. 199-204）。

(Gamification: Shifting Boundaries between the Ludic and Non-Ludic) 專案，探討決定遊戲與非遊戲區隔的文化因素，在何種程度上可作為遊戲化判斷的參照，以及該區隔如何發生，並最終回答「數位媒體在何種層面上產生出質變性影響？」這一根本性問題；另一方面，與美國高校合作創立「史丹福－呂納堡暑期學院」，主導體美合作的國際性專案。該學院有兩項關注重點：一為矽谷與人文學科的交融；另一則為德國媒介理論及其當下的認知論思潮（特別是數位文化）。迄今，該學院已舉辦兩屆活動，分別為：2019 年的「反當下主義：歷史化媒介性」（Against Presentism: Historicizing Mediality）和 2021 年的「官僚技術：數位轉向前後」（Technologies of Bureaucracy: Before and After the Digital Turn）。

就皮亞斯的控制論研究路徑而言，從電腦遊戲到梅西會議，再到數位轉向所帶來的媒介與後官僚（post-bureaucracy）的關係更新與惡化（由數位儲存、分配、重演、擴大和切換所致），並不令人意外。事實上，早在《控制論：梅西會議，1946-1953》的導言中，Pias（2003, p. 22）已經提到“Gouverner, c'est prévoir”（統治即預見），而預見則是控制論的核心命題。

伍、結語：再反思

是否存在德國媒介理論，迄今仍有爭議。在學者看來，「並無『德國媒介理論』這樣東西，無論是舊的還是新的……所謂的德國媒介理論，僅被當做一種可靠的牌來使用，與德國汽車或德國啤酒不無相似」（Horn 2008, p. 8）。然而，溫特洛普·楊表示，在今日，若要進行真正嚴肅的媒介理論，必須要進入到在德國所做的這些（Winthrop-Young, 2006）。德國媒介理論最引人矚目的是一批「高調的、建構和系統理論的文章」（同上引）。

與此同時，當前這代德國媒介學家間的聯繫也頗為緊密。他們共享一些標籤，如控制論、文化技藝、媒介考古、可操作、物質性等，並持有強烈的媒介哲學取向，重視本體論和認知論層面的思考，沿襲媒介技術（基德勒）、深度時間（齊林斯基）和過時的詩學（埃爾塞瑟）等早期媒介理論的軌跡，以高度個人化風格的研究，突破和發展自身學說，推動了德國媒介研究的第一次轉型：從早期媒介理論到文化技藝。

這一轉型是否已經完成呢？就代表作來看，其主要人物的思想在 2016 年前已經成型，例如，皮亞斯的《電腦遊戲世界》（*Computer Spiel Welten*）

(2002)、《控制論：梅西會議，1946-1953》(2003)；西格特的《文化技藝》(*Cultural Techniques: Grids, Filters, Doors, and Other Articulations of the Real*) (2015)；恩斯特的《數字記憶與檔案》(*Digital Memory and the Archive*) (2012)、《計時光學》(*Chronopoetics: The Temporal Being and Operativity of Technological Media*) (2016) 等。也是在 2016 年左右，開始湧現大量質疑和反思「德國媒介理論」存在合法性的討論。這是令人困惑的，正如皮亞斯在 2016 年時所言，德國媒介理論已相當成功，並無學術研究上的危機或困難，如資金短缺、學說單一化或沉寂等，反而有許多的會議與專案，並在世界範圍擴散影響。對此，皮亞斯認為或許真正的問題，不是「何為德國媒介理論？」，而是「為何在現在 (Now) 來討論？」(Pias, 2016, p. 19)。

從該視角切入，2016 年可視為標誌性年份。此前，文化技藝研究已基本完成對基德勒所代表的早期媒介理論的變節式突破；此後，德國媒介研究的發展，面臨兩種選擇：一是整合，意即錨定相對集中、明確的研究對象與方法，朝著學科建制化發展；另一則是離散，意即延續過往十多年的行為學風格，以高度個人化的討論進一步推動多種學說發展。

本文通過考察、分析 2016 年至今，文化技藝、媒介考古以及控制論的近況，發現當前德國媒介理論兼具整合與離散的特點。在研究領域上，逐漸聚焦數位當下；在風格上，延續個人化風格。這種特點或可稱為「遞歸」(recursive)。遞歸本是計算研究用語，指直接或間接調用自身函數／方法的演算法。在控制論中，遞歸常與反饋機制相提，作為自身指涉和異己指涉的表達。作為與偶然 (contingency) 相對的詞語，遞歸已成為當前技術哲學關注的一大重點。

不同學者對於遞歸有著不同的理解，並在不同的語境中使用，比如，在斯蒂格勒 (Bernard Stiegler) 的弟子許煜看來，「遞歸不是機械的重複；它以回溯自身的回環運動來確定自身，其每項運動都對偶然性開放，而這又反過來確定了其奇點」(Hui, 2019, p. 32)。又比如，在前文基德勒 2006 年的採訪中，他就提到「與其關注線性歷史，我們應該取而代之去思考我們稱之為『遞歸的歷史』」，所指的便是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規律的間隔出現，但是有著不同含義和結果」的那些「同樣的議題」(Armitage, 2006, p. 33)。

當前德國媒介學者不斷回溯基德勒，並指涉彼此的學說，使得遞歸一詞在廣義上，可被用來描述目前德國媒介理論的一種近況發展。且該詞所具有

的強烈數位性，也契合他們對於電腦的高度關注，這也是西格特、恩斯特和皮亞斯三人研究的交匯點。西格特在論述可操作本體論時曾談及電腦，認為「它們依附於甚至被卡於廣延性的事物（*res extensa*），正是這一點將傳統本體論與可操作本體論區分開來」（Engell & Siegert, 2020, p. 8）；恩斯特的激進媒介考古強調時空邏輯（*temporal spatial-logische*），其在流動性、廣播和空間地理上的探索，已在實踐上與山農、諾伊曼及圖靈機接通；皮亞斯的電腦遊戲、梅西會議、模擬等研究則是對以電腦為對象的控制論歷史的不斷重構。

概言之，2000 年初以來，早期德國媒介理論朝著文化技藝轉型，並在 2016 年左右大體完成。目前德國媒介研究，逐漸聚合於數位，呈現遞歸態勢。當中，已嘗試與英美後人類研究、媒介生態學及法國後行動者網絡理論等鏈接。問題是，能否有朝一日真正產生一種通用媒介理論（*universal media theory*）呢？答案是開放的，正如浮士德的「太初有為」（*Im Anfang war die Tat*），目下德國媒介研究亦是一種「有為」，一種「行動」（*Tat*），也因此仍在持續建構之中。

參考文獻

- 李 漫 (2013) 。〈批判與實證：德國傳播研究的進路及其反思〉，《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1）：134-140。
- 吳璟薇 (2017) 。〈中德新聞傳播教育的比較與思考〉，《中國新聞傳播研究》，1：97-100。
- Armitage, J. (2006). From discourse networks to cultural mathematics: An interview with friedrich a. kittler.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7-8), 17-38.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06069880>
- Bateson, G. (1987).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 Jason Aronson Inc.
- Elsaesser, T. (2016). *Film history as media archaeology: Tracking digital cinema*.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Engell, L., & Bernhard, S. (Eds.). (2018). Eeditorials. *Zeitschrift für Medien-und Kulturforschung*, 9(1), 6-13. <https://meiner.de/zmk-zeitschrift-fur-medien-und-kulturforschung-9-1-2018-mediozan.html>
- _____. (Eds.). (2019). Eeditorials. *Zeitschrift für Medien-und Kulturforschung*, 10(1), 5-12. <https://meiner.de/zmk-zeitschrift-fur-medien-und-kulturforschung-10-1-2019-ontography.html>
- _____. (Eds.). (2020). Eeditorials. *Zeitschrift für Medien-und Kulturforschung*, 11(1), 5-12. <https://meiner.de/zmk-zeitschrift-fur-medien-und-kulturforschung-11-1-2020-schalten-und-walten.html>
- Ernst, W. (2012). *Digital memory and the archiv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_____. (2014). *Zwischenarchive: Die zeitform der Digitalen Gesellschaft Speichertechnische Irritationen der Gegenwart* 演講於 2014 年 11 月 12 日發表於 Forum Internationale Wissenschaft (FIW) der Universität Bonn (Vortragsreihe Perspektiven der Moderne, Themenschwerpunkt “Digitale Gesellschaft”) https://www.musikundmedien.hu-berlin.de/de/medienwissenschaft/medientheorien/Schriften-zur-medienarchaeologie/aufsaeetze_vortragsskripte/pdfs/medarch-digital-bonn-kurz.pdf
- _____. (2016). *Chronopoetics. The temporal being and operativity of technological medi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_____ (2018a). Radical media archaeology (its epistemology, aesthetics and case studies). *Artnodes*, 21, 35-43. <https://doi.org/10.7238/a.v0i21.3205>
- _____ (2018b). Tracing tempor(e)alities in the age of media mobility. *Media Theory*, 2(1), 164-180.
- Geoghegan, B. D. (2013). After kittler: On the cultural techniques of recent german media theor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66-82.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488962>
- Horn, E. (2008).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re are no media. *Grey Room*, 29, 6-13.
- Huhtamo, E. & Parikka, J. (2011). Introduction: An archaeology of media archaeology. In E. Huhtamo & J. Parikka (Eds.),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pp. 1-2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ui, Y. (2019). *Recursivity and congingency*.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 Kittler, F. (1986). *Grammophon film typewriter*. Brinkmann & Bose.
- Krämer, S. (2006). The cultural techniques of time axis manipulation: On friedrich kittler's conception of media.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7-8), 93-109.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06069885>
- Kreuzer, H. (1997). Ein Germanist, der als eine Art von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ler gilt. In A. Kutsch & P. Horst (Eds.),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autobiographisch: Zur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pp. 223-242). Westdeutscher Verlag.
- Kutsch, A., & Horst, P. (Eds.). (1997).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autobiographisch: Zur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Westdeutscher Verlag.
- Maletzke, G. (1997). Erlebte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 im Rückblick. In A. Kutsch & P. Horst (Eds.), *Kommunikationswissenschaft-autobiographisch: Zur Entwicklung einer 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pp. 110-119). Westdeutscher Verlag.
- Pias, C. (2002). *Computer spiel welten*. Sequenzia Verlag.
- _____ (2003). The age of cybernetics. In C. Pias & V. Joseph (Eds.), *Cybernetics: The Macy conferences 1946-1953* (pp. 11-26). diaphanes.
- _____ (2016). What is German about German media theory. In Friesen (Ed.).

-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tween north american and german-speaking europe* (pp. 15-27). Springer.
- _____. (2017). Simulation. In B. Timon, J. Metelmann, & C. Pias (Eds.), *Nach der Revolution: Ein Brevier digitaler Kulturen* (pp. 89-102). Tempus Corporate GmbH.
- Pias, C., & Joseph, V. (Eds.). (2003). *Cybernetics: The macy conferences 1946-1953*. Diaphanes.
- Schröter, J. (Ed.). (2014). *Handbuch Medienwissenschaft*. Verlag J. B. Metzler.
- Siegert, B. (2007). Cacography or communication? Cultural techniques in German media studies. *Grey Room*, 29, 26-47. <https://doi.org/10.1162/grey.2007.1.29.26>
- _____. (2013). Cultural techniques: Or the end of the intellectual postwar era in German media theor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48-65.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488963>
- _____. (2015). *Cultural techniques: Grids, filters, doors, and other articulations of the real* (G. Winthrop-Young, Trans.).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20). Attached: The object and the collective. In J. Dünne, K. Fehrer, K. Kuhn, & W. Struck (Eds.), *Cultural Techniques: Assembling Spaces, Texts & Collectives* (pp. 131-140). Walter de Gruyter.
- Vismann, C. (2013). Cultural techniques and sovereign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0(6), 83-93. <https://doi.org/10.1177/0263276413496851>
- Winthrop-Young, G. (2014). The culture of cultural techniques: Conceptual inertia and the parasitic materialities of ontologization. *Cultural Politics*, 10(3), 376-388. <https://doi.org/10.1215/17432197-2795741>
- Winthrop-Young, G., & Rudolf, M. (2006, May 29). Deutschland ist ein medienprodukt. *Heise online*. Retrieved May 30, 2021, from <https://b.hatena.ne.jp/entry/s/www.heise.de/tp/features/Deutschland-ist-ein-Medienprodukt-3406021.html>
- Zielinski, S. (2006). *Deep time of the media: Toward an archaeology of hearing and seeing by technical means* (G. Custance Trans.). MIT Press.

本文引用格式

許媚媚（2022）。〈文化技藝、媒介考古和控制論：德國媒介研究近況闡述〉，
《傳播研究與實踐》，12（1）：1-22。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
112022011201001

Xu, M. M. (2022). Kulturtechnik, media archaeology, and cybernetics: On recent
developments of German media stud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1), 1-22. http://dx.doi.org/10.53106/2221141120
22011201001 [Text in Chinese]

Kulturtechnik, Media Archaeology, and Cybernetics: On Recent Developments of German Media Studies

XU, Mei-Mei*

Assistant Researche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Abstract

For the past few years, German media theory has achieved a broad attention inside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Works by Kittler, Zielinski, Elsaesser, and more recent ones such as Pias, Ernst, Bernhard, Krämer, Vismann, etc.,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Concepts such as media archaeology, media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techniques have also been explicated. However, due to sporadic translations and lack of research, these works often appear to be confusing and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Based o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method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German media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German media theories and its generational chang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ree representative Kittlerian media theories, i.e. Kulturtechnik, radical media archaeology, and cybernetics, especially on their most recent influences, in order to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rebellious, apostate, and recursive trends under which German media theories have developed since 1980s.

Keywords: cultural techniques, cybernetics, Kittler, media archaeology, German media theory

* E-mail: xumm@nju.edu.cn

Received: 2021.04.08; Accepted: 2021.10.28